

“上海老城厢”场域中的历史记忆

古春霞¹

(浙江科技学院 马克思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城市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延续历史记忆的有效介质。历史记忆作为记忆的一种社会属性,包含着个人和集体在时空中的体验,它是自我和社会存在的根基。上海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老城厢是集庙、园、市三种功能叠加所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的习性和文化基因,随着记忆重塑,巩固着一定的惯习和意旨,承载着历史和文化,老城厢被不同时代的记忆主体想象和建构,具有很强的情感召唤功能,引发思考,塑造记忆,与文化遗产密切相连。它受不同时空维度中历史记忆的互相影响,形成带有指向性的意义载体,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记忆当中,赋予了老城厢多重意象,而多种意象的叠加使老城厢呈现出独有的灵韵,生生不息,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城市向心力。

【关键词】: 上海老城厢 时空维度 场域 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9)03-0080-05

城市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延续记忆的有效介质。人们对城市历史的关注,都是从富有灵性的特色建筑与街道开始的。上海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相汇之地,也是庙、园、市三种功能叠加所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上海老城厢集合了海派文化、本土文化和市井文化,各种文化在此相互濡化和涵化,既有摩登的一面又有接地气的一面,五方杂处,吐故纳新,自成一派,很受中外游客的青睐;尤其是众多的传统文化品牌,鼎故革新,绵延不息。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场域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视阈,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具有更深一层的空间意义及象征意义。他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老城厢在各种关系的角力中,传承历史的记忆,保持自我特色,成为都市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一块窗棂,一堵墙,一个石磨,每一件看似陈旧的摆设都能给人以无尽的回味和畅想,这里浓缩着上海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市井生活百态。老城厢是上海历史的发祥地,也是这座城市的起点和基石,在文化、地域、功能上都有着独特的历史灵韵,是镌刻在上海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永恒记忆。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城市具有一种容器功能:“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2]老城厢的历史对上海来说便是这样一个容器,融聚历史的变迁,见证文化的积淀。在一切都以转瞬即逝的速度在更迭前行的时代,一座城市的灵魂与内在的腔调是其标识度的关键,也是一座城市独特的内蕴所在。老城厢便是上海独特的地域标识所在。不同的时代、环境、种族会造就不同的城市风貌,历史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属性,包含着个人和集体在时间中的空间体验和空间中的时间体验。老城厢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的习性,随着记忆重塑,巩固着一定的惯习和意旨,承载着历史和文化,并得到传承和理解,影响着上海未来风貌的形成。

一、时空标识度——空间记忆里的“东方的威尼斯”

上海昔日号称“东南泽国,东方的威尼斯”,上海城墙外围有护城河,宽六丈,深一丈七尺,“周围回濠,外通潮汐”;在跨肇嘉浜(今复兴东路)、方浜(今方浜中路)处,设了水门。另外,在其周边还分布着不少河道,它们互相贯通,并经护城河与城内水网相连。这些河道上的好多桥梁较为重要,如陆家浜上的斜桥、洋泾浜上的东新桥、周泾上的八仙桥、肇嘉浜上的打浦桥等,其名

作者简介:古春霞,女,浙江科技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艺术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迄今仍被附近地段作为习称沿用。曾经的老城厢似一幅“清明上河图”，随处可见“小桥、流水、人家”，与吴越水乡文化一脉相承。从前密集的水网，曾为人们的生活用水和交通运输提供极大便利。后来，肇嘉浜不断淤浅，方浜逐渐被两岸建筑挤窄，许多河道阻塞断流，肮脏不堪。1906年，福佑浜首先被填筑成马路。辛亥革命后，为了改善交通，大规模地“填浜筑路”，众多河道演变为后来沪南道路网的骨架，上海的水城风貌最终悄然隐去。

作为一个城市重要的生态要素，便是它所处的地理方位，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汇合处，水系发达，控江踞海，上海早期的官方机构“上海务”出现于北宋时期，集市镇形成于南宋时期，上海县建立于1291年，上海逐渐成为控江踞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明代中叶开始，倭患便不断骚扰，上海人民“众志成城”，建筑起环城墙，有效地抵御了倭寇侵扰。人们一般称城墙内为“城”，城墙外为“厢”，这就是老城厢名称的由来。上海老城厢是指如今上海市黄浦行政区（包括历史上的黄浦区、南市区和卢湾区）的人民路—中华路以内总占地面积为199.72公顷的地区。在不大的老城厢有着路、街、坊、里、弄等大小道路数百条。城里并不是规则的网格状，而是犬齿交错、四通八达。

老城厢是上海的源头和策源地，厢在吴语中是婉约隐蔽之所，五方杂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它就以这样温婉的方式绵延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之中。空间感是交流的最普遍的本质所在，一方面由于人的存在可以感知空间、使用空间，另一方面人可以以自我的存在为依据设计空间，使其产生意义。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鸦片战争前，上海县城河道交错，桥墩纵横，有舟无车。县城内外随处可见“小桥、流水、人家”。而且还形成不少与水有关的佳景，如凝和浜分出一条小支流（今梅溪弄），因其东北小蓬莱道院遍植红梅而被唤作梅溪，又如宝带门外方浜上的陆家石桥（位于今东门路、外咸瓜街交汇处），高二十四级，有三个环洞，中秋夜月影穿桥洞倒映水中，“沪城八景”中的“石梁夜月”即指此处。此外，古露香园池、城隍庙园湖、文庙泮池等名胜均以附近的河道为水源。在城内，东西向干河有肇嘉浜（今复兴东路）、方浜（今方浜中路）和薛家浜（今乔家路、凝和路、尚文路），南北向干河有中心河（今金家坊、红栏杆街、小桃园街、河南南路、净土街、亭桥街部分路段）。肇嘉浜自关桥（位于今白渡路东首）引黄浦江水入朝宗门，横贯中心区域，往西出仪凤门。方浜自外十六铺桥（位于今东门路东首）引黄浦江水入宝带门，缓缓流向西城根，中间有一小岔流称花草浜。薛家浜自外薛家浜桥（位于今油车码头街东首）引黄浦江水入朝阳门，分段称乔家浜、凝和浜、守署浜，曲折地向小西门延伸。众多小浜组成了密集的水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7年第九届会议上形成的决议：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具有纪念性的空间和朗朗上口的俚语，具有很强的触动情感、激活思考、塑造记忆的功能。

现今，上海的老西门是人民路和中华路交接的地方，沿着这两条路走，就会经过老西门、小北门、老北门、新北门、新开河、小东门、大东门、小南门、大南门。这四个方向大大小小的门围成的一圈就是上海的老城厢，沿着人民路、中华路行驶，沿途所见皆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老城厢的这一圈内还包括了城隍庙、豫园、沈香阁、文庙，它们分别代表了信仰、平安和文化。过去的生活经验随着岁月的积淀，逐渐成为历史记忆，使过去不断被刺激复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从微观上看，城市中的某些部分可作为容器，这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室外空间的容器，指由建筑或其他建构物围合起来的空间，如街道、广场、公园等传统的公共空间；二是室内空间的容器，指建筑内部，如博物馆、体育馆、购物广场等公共活动中心。”^[3]老城厢聚集了这些功能，她集庙、园、市三位于一体，既保留了老上海的市井文化，又具备了崭新的文化和经济功能。上海老城厢古朴精致的建筑也历经嬗变。如上海老城墙，在上海开埠后，城墙的屏障功用消失殆尽，而且制约了上海的发展。1912年，上海城墙被陆续拆除，作为某种纪念，残留了一段。1995年，经精心修葺，老城墙又一次华丽转身。它独特的地理标识度具有很强的储存记忆功能，使其逐渐经典化和神圣化，成为上海令人难以忘记的文化载体。

二、文化标识度：历史记忆中的“豫园”

城市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创造的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体，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也是民族延续记忆的重要载体，每个时代都会在城市当中留下自己的印迹。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都非常注重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标识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它们承载着人类璀璨的历史记忆。个体和群体在这物化的建筑形态中寻求慰藉、回忆和期待，挖掘出不同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功能。中国古代的达官士人则喜欢营造能够传达内心意志和情怀格调的亭台楼榭和私家园林。比如豫园及其“翰墨情”和“丝竹情”，就完全融入到老城厢的建设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脉、独特的符号语言，蕴含着老城厢独有的人文密码和人文情怀。

1. 老城厢独有的文化标识——豫园。

从宏观上来说,城市景观空间环境的关系都会被历史文脉所影响。人类一直活在自我建构的意义符号之中,“这些记号为人类开发世界,使之象征化并唤回它,而他的环境也被置于其中”^[4]。“豫园”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最惯常做派的反映。自明代中后期开始,江南兴起了兴建私家园林的风潮,苏州的私家园林数不胜数,上海也为数不少。豫园园主潘允端是明刑部尚书潘恩之子,他营建了这座私家园子,通过这种社会生活形式和行为准则传达了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观。豫园以“陆具岭涧洞壑之胜,水极岛滩梁渡之趣”称冠东南名园。正如尼采所言,人类之所以会成为这样一种生物,不是像动物一样“被束缚于眼前的楔子上”,而是可以在更广阔的物象关联里为自己留下存在于世的痕迹,更多的是因为人类赋予精神的和内心世界以稳定性与持续性,而积极主动规避了生命的易逝性和短暂性,例如上述通过建造一座自己的园林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标识,以便得以代代传承。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2年)至今的几百年里,居住者几番更迭,豫园都让人难以忽略而得以传承,它是上海的根,同时也随着城市变迁完成了重塑。鸦片战争以来,上海被迫开埠通商,建立租界,逐渐形成了以开放、多元、文明、时尚、创新、变革为标志的海派文化,在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气韵、城市风貌和精神品格。豫园是海派建筑中中国园林的坚守和见证,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实属难得,成为一种独有的文化标识。因其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气韵,园内亭台楼阁水榭假山与苏州园林并驾齐驱,布局上以疏密得当、精巧雅致著称。芜杂繁冗的名堂掌故,是一代又一代士人永远的憧憬。其记忆的精神属性都附属在物质现实的豫园之上,才成为了一个群体共享的内涵。法国学者刘易斯曾说:“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5]93}

豫园的梦花街、大镜阁、书隐楼、白云观等,这些具有中华独特传统内蕴的命名,在不同程度上承载着情感的联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凝聚力。即使上海较早开埠,长期作为西方的租界地,西化的印迹明显,豫园依然能够独善其身,以其独特的红瓦屋顶、清水砖墙、老虎窗、过街楼等老上海的文化属性,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从容过渡。比如书隐楼这栋明清建筑:庭院深深,马头高墙,飞檐翘角,显赫匾额……让人生出无数沧桑的感怀,个体和群体在这些象征符号中寻找灵魂的归宿。又比如梦花街,这是一个容易浸染回忆的地方,它会像一壶花露烧,酒色清欢,它是老城厢一种诗意的存在,远离咫尺的喧嚣,知识和经验的循环空间,使之象征化、符号化,并可以在永恒的精神长河里固化、传承下来,比如通过名称、图案、花纹、道路、标记、景致等形式表现出来。再比如文庙旧书市集,民间以自己的方式,对崇文善学表达出一种顶礼膜拜。因为对读书的重视,每年的六月份文庙会有一次集体的狂欢,大成殿前方的祈愿树上挂满红绸,画有孔子像和魁星阁的纸符道出每个读书人的心愿,这些多是面临升学压力的莘莘学子做出的虔诚祈愿;也有外国友人的纸条,是祝愿自己的孩子身体健康,可见功能逐渐多元化、国际化。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5]24}老城厢的精神坐标,在这些历久弥新的老建筑里蓬勃生长。

2. 豫园的“翰墨情”和“丝竹情”。

每一座精神家园的形成,都是集体记忆和智慧演绎的结晶,跌宕起伏的人物故事、家族兴衰,共同成就了豫园的无可复制性。历代文人、名伶、鸿儒在此共赴一场与传统中华文化的灵性之约。书画善会和江南丝竹之于豫园,都是这座江南名园的文脉所系,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1909年春天,在豫园成立了书画善会,文人墨客云集,在此进行聚会交流,助赈善款。体现了海派文人秉承儒家入世的理念,不断寻求精神突破和共济天下的担当。在当下,豫园商城的华宝楼里由几个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创办了“吾同书局”,它的创意性和艺术性,带着上海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厚重的情怀在里面,也非常符合豫园商旅文化的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建的豫园,深知文脉传承和传播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丝竹大家董克钧在豫园的湖心亭开始招收一批青年丝竹玩家,在此研修丝竹乐曲,集教学、演奏、研修于一体,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传播。1986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造访豫园,并在湖心亭欣赏了上海评弹团著名演员石文磊的《湖心亭阵阵飘香》,又聆听了笛子演奏家陆春龄的英格兰民歌《乡村花

园》等,女王还特意和湖心亭丝竹演奏队的15位乐师见面,豫园丝竹被各国电视台转播,一下子唤起上海市民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国的文化标识而被众人所知。之后豫园的丝竹演奏队群英荟萃,接待过众多国外嘉宾,这段上海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共同音乐记忆成为美谈。豫园的湖心亭隐含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认同,带着一种逐渐沉淀的“权威性”。

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6]老城厢的“当下性”与“社会建构性”是“集体记忆”的两个重要特征。豫园的记忆定格了上海的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并被重新建构且规约未来。哈布瓦赫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一段“过去”可能形成不同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而豫园的建设就是在众人的期待下逐渐建构的。在这里充满着集体的记忆和智慧,哈布瓦赫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8]335}。可见,哈布瓦赫所理解的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豫园在新时代的打造和建构,就是为了使过去的形象适应于现在的精神需求。

三、符号标识度:民间记忆与象征资本

1. 弘扬传统文化,文化引领消费。

老城厢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总体上是庙、园、市三种功能叠加所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老城厢恰到好处地集合了海派文化、本土文化和市井文化,既有摩登的一面又有接地气的一面,很受中外游客的青睐,尤其是众多的传统文化品牌符号,代代相传,包含着几代人深厚情感和记忆。譬如传统美食:南翔小笼包、蟹黄灌汤包、上海三黄鸡、上海生煎包、大闸蟹等;传统的服饰:旗袍、团扇等;传统的美容用品:谢馥春三绝“香”“粉”“油”等。老城厢里是五方杂处,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间烟火中传递着深厚的民俗风情和文化底蕴。老城厢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更是一种文化进程。商业资本在这里充满了民间情怀,其消费的动力就是不断满足人们对海派文化的建构和消遣,对传统城隍庙的崇敬和期待,对豫园这座私家园林的欣赏和品味。满足人们从物质消费到精神需求等多元化的期待。特别是在共同体的建构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消费理念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活方式开始追求精致和个性体验,集庙、园、市三位于一体,使得老城厢的魅力难以抵挡,集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商业功能于一身,以人文为底蕴的商业价值倍增。

文化资源的价值包含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价值,老城厢的文化价值包括城市建筑景观创造过程中物质积累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人道,以及人类的文化和历史。老城厢的传统文化体系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脉络结构,表现在“天圆地方”和“象天法地”两方面的,这两方面的文化思想一直影响着城市空间发展的价值取向。从微观上来看,城市景观的风格和特征都深深烙下了历史文脉的印迹。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的老城厢,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作为母题,立足差异化,避免同质化,大力传承传统民族文化,坚持和弘扬豫园的文化 and 经营特色,使老城厢成为一种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意义空间。

2. 传承民族品牌,拓展文化资源。

如果说在政治空间生产中,国家权力占据主导地位,目的是对受众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的话,那么消费空间生产增值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借用历史文化进行再生产。老城厢作为老上海的重要标志物之一,具备“符号化表征”的地方有很多,符号商品的价值依赖于消费者对它们实用功能的期望,例如霍光殿、甲子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父母殿、关圣殿、文昌殿;梦花街、文庙、大境阁等具有浓郁民族传统的地名,又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人们对传统的需求和期待,成为民族品牌的原动力。现在总面积约二千余平方米的城隍庙,每到初一十五,虔诚的民众都会赶来祈福,在他们的内心,也许并没有太在意宗教的形式和原则,他们需要的只是精神上的凝聚力,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慰。老城厢的存在,就让城市的灵魂和欲望有了归属地。在殿堂的外头,那些丰富多彩的小吃和物质消费,终于还原了物质生活的原貌,绵密质感的物质消费、内心的安定满足还是来源于对某种传统文化的尊重。豫园商城拥有豫园灯会、老饭店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13个,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两项,这些经典技艺是豫园宝贵的财富,既有艺术上的观赏性也有物质上的商业性。老城厢作为上海历史的发祥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也使其成为邻近的

上海外滩这一全球化时尚消费的有力补充,由此,本土文化和海派文化、市井文化杂糅、并置、拼贴,彰显出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生产方式。

城隍庙不仅进行着丰富的物质文化再生产,同时它还可以尽情彰显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在文化的传承、传播上尽情发挥其地域优势。这里也曾是各种军政衙署的集中地,还是各类文人居住之地,有着深邃的文化积淀。旧时的石桥上颇多楹联,通常刻于桥孔的两侧,或镌于桥墩的立柱之上,阴阳刻工皆有,书体则真行篆隶俱全,边读边品,也颇有趣味。石桥上的楹联,以写景的居多,结合本地的山光物态,或借景抒怀,或状物遣兴,成就了上海百年的时光。另外,诸如花岗石门券,方砖贴面,考究的门头,双叠式出檐椽,砖雕斗拱、砖雕梁枋、砖雕挂落,雕出莲、荷、梅、菊、如意等图案的消费空间的生产中,传统的人文精神承担着重要的美育功能、德育功能。老城厢功能的复兴成为塑造城市景观与文化特色的最佳手段,而中西合璧的风格非常契合全球化和地方本土化的完美融合。

四、结语

任何一个场所都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质和气韵。这种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完成的。就上海老城厢地段而言,不同时空历史记忆互相影响、互相刺激和补充,在相互作用下,赋予了这里的空间多种意象,这多种意象的叠加使老城厢具有一种民族凝聚力。莫里斯·哈布瓦赫明确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他认为:“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5][106]} 传说的故事越久远,历史的底蕴越深厚,文化叙事的张力就越广阔。在老城厢寻根探脉,挖掘那些隐藏在时光深处的历史长河,反哺我们当下的文明,倾听守望者的声音,记录曾经的吴侬软语,这些文化底蕴是上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瑰宝,也是老城厢历史记忆的宝贵资源。这种历史记忆,是选择性“重现”过去的工具,让人文内涵蕴藏在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中,呈现其独有的灵韵,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向心力。这种在历史记忆下逐渐形成的“场所精神”,是集中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记忆当中,从多个方面和角度紧紧引领着人们精神世界的活动,从而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并产生一种内在驱动力,推动着人们的生活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 [1]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6.
- [2]杨建.城市:磁体还是容器[J].读书,2007(12):12-18.
- [3]孙雪梅.浅谈容器——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J].中华建设,2011(15):58-59.
- [4]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麻.文化理论记忆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 [5]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6]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